

祝 贺 与 期 望

— 代 发 刊 词

李 佃 杰

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所编辑的《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一期，已经问世了，这是值得祝贺的事，祝她持久办下去，越办越好！文史资料工作意义重大，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关系到精神文明的建设，惠及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编辑与出版，不但关系到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对于地方修史编志，对于四化建设，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邓颖超主席指示：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应当坚决贯彻执行，努力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嘉兴是我国东南的名城，是中共一大会议址之一南湖的所在地，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文荟萃，物华天宝，近现代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出现过不少著名历史人物，史料丰富多采，宝藏有待挖掘。过去由于“左”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能持续地、有计划地开展起来，致使许多史料沉沦湮没，实属可惜。现在历史进入新的时期，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我们要以抢救的姿态，广征博采，开展征集，並做好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工作，给后代留下一批历史文化遗产，再也不能听任史料湮没了。我们创办这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史料，更是为了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发动广大人士踊跃提供资料，积累更多的宝贵材料。这里发表的素材，

不等于完全无误，更不是篇篇观点正确，只是提供一个园地，为培育地方史志的花卉创造一个条件。对于较重要的稿件，我们以后将汇编成选辑正式印行。文史资料之花有赖于各方面人士的浇灌，只有依靠大家关心支持，才能根深叶茂。今当这本通讯发刊之始，我们祝愿她的成长，更期待着各方面人士踊跃赐稿，并对不足之处多加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月

革命美术家沈振黄的一生

沈 平

沈振黄（一九一二年——一九四四年），原名沈耀中，浙江嘉兴人，家在城内南大街八十一号。童年在东栅口镇外公家念完小学后，到上海进中学。他的父亲沈阜升，当过教师，清末赴日本留学，抱有实业救国思想。一九〇五年，清政府申通日帝驱逐留日革命学生，他不愿受辱求学，遂罢课返国，参加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在国民党海军任职，曾任永平号军舰舰长。沈振黄在父亲影响下，一九三〇年考入上海中法工学院，攻读铁路工程专业。他从小喜欢画画，在中学读书时，经常以美术字和绘画习作，投稿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等杂志，同青年文艺爱好者互相切磋。他在中法工学院念了两年，于一九三二年报学，被开明书店录用，担任绘制书刊插图、装帧工作。他所绘制的书刊插图、装帧设计，简洁明快，别具风格。他曾与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合作，首创世界时事图解。不久，沈振黄到著名革命文化战士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编辑部工作，在周刊上发表了不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漫画。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对救亡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

沈振黄进入上海文化界后，同进步的文化艺术前辈往来密切，不断地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指导，特别是获得鲁迅先生的关怀和教益。一九三六年，在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感召下，准备从事木刻创作。他读到鲁迅以“铁木社”名义出版的《木刻纪程》后，曾写信给“铁木社”要求“铁木社”介绍一些木刻作者认识。鲁迅以“铁木社”名义亲自写了复信。这封信现已编入《鲁迅书信集》。当时鲁迅虽没有为沈振黄介绍木刻作者，但作了十分恳切的回答，后来还推荐和赠送了世界著名版画家柯罗惠支的作品集。这使沈振黄的美术作品，不论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思想方面，都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鲁迅也曾召集黄新波、沈振黄等木刻爱好者一起座谈。当鲁迅不幸病逝的消息传到沈振黄处，他满怀悲痛地跑到万国殡仪馆参加悼念活动，拍摄了许多鲁迅遗容和各界人士前往悼念的照片，在报刊上发表。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沈振黄坚决放弃在上海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求上前线去。他经过夏衍推荐，参加了中共长江局直接组织和领导下的一个大型的政治文化工作队伍。这个队由郭沫若介绍到当时守卫在上海浦东防线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处，名称为战地服务队。由周恩来同志指派著名的文化人钱亦石为队长，沈振黄担任该队宣传科美术股股长，林默涵等同志都在该队工作。他们从上海出发，曾驻于嘉兴洋关，郭沫若同志曾到该队探望。后来，他们不辞艰辛地奔赴江、浙、赣、鄂、湘、粤、桂前线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奋起抗日。沈振黄在高墙残壁挥动画笔，制作了大量抗日宣传画，并用排笔写下了大批标语，也有时采用木刻和油印画报，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一九四〇年后，因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一再发动反共高潮，战地服务队被迫撤离前线，退守到后方，沈振黄并不因此而气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只要有条件

人民，有利于革命的工作，他都积极参加，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一九三九年，沈振黄在广东曲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先后直接领导下，隐蔽于国民党部队的特别支部的一员。一九四四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湘桂沿线时，国民党军大溃败，沈振黄接受我党特别支部的指派，担任柳黔公路的检查工作和护送受难的进步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十一月二十五日，敌军日渐逼近，柳州局势十分紧张，沈振黄携同其家属搭乘最后的一批汽车，护送难胞向后退，途中遇一老妇哀求搭车，他让出自己的座位给她，自己坐到车顶上。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疾驰，加以连日疏散工作劳累过度，沈振黄不幸从车顶上摔下，脑盖迸裂，脑浆涂地，血流不止。车至贵州独山，抢救无效，终于在二十六日献出生命。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中共重庆文委支持下，重庆文化出版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有数百人参加。主祭人沈钧儒、丰子恺、范洗人、郭沫若到会，亲致悼词，对沈振黄为抗日战争事业而光荣牺牲，作了很高的评价。追悼会收到了很多知名人士题送的挽联，其中郭沫若的挽联为：“民主前途欲明还暗，我兄高义虽死犹生”。沈钧儒的挽联为：“小己生命轻一掷，服务精神足千秋”，赞扬沈振黄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出刊了悼念沈振黄的专页，夏衍、叶圣陶、徐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撰写了哀悼文章。在其它报刊杂志上，宋云彬、彭子冈等文化新闻界人士也都发表了悼念文章。

一九五〇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批准追认沈振黄为革命烈士。沈振黄的大量画稿原保存于其夫人朱曼其及妹夫田竞强处，迭经动乱，全已散失，殊为可惜。

（作者沈平同志系沈振黄同志之妹、新华社记者）

三十年代初嘉兴监狱中的 政治犯斗争

罗 俊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接连发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先后侵占东北并进攻上海，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当时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和抗日运动。上海和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纷纷要求抗日。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对内则实行疯狂的所谓“围剿”政策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人民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破坏，千千万万的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学生抗日运动，被上海大夏大学开除，就转入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因无犯罪证据，又未暴露革命身份（当时我任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国际性革命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宣传部部长），以共产党嫌疑判刑五年，后以国民党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全国大赦，减刑为二年半。原关在上海马斯南路第二特区监狱，因我们政治犯进行多次狱中斗争，当局甚为惊慌，乃把我们政治犯分别疏散到外地关押。一九三三年二月间，我们一批政治犯十二人转押到嘉兴监狱。同年十一月，嘉兴监狱因我们进行过绝食斗争，感到难予管理，又把我们分批转送到苏州反省院关押。我们在嘉兴监狱关了约九个月，因时隔五十年，有些人名、细节已记不清楚，经与当时同狱的陈适五同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在狱用名胡玉书）共同回忆，大致情况如下：

嘉兴是历史上早已闻名的江南文化古城，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但嘉兴监狱之腐朽落后，实在令人意外惊讶。当我们第一天押到嘉兴监狱时，已是傍晚，全狱昏暗阴森，走过两排囚房过道时，忽听到两旁一片凄凉的念经声和沉闷的木鱼声，好象到了荒山古庙，真似人间地狱。为了表示一点抗议和革命声势，我们十二个政治犯同声高呼三个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意外的行动，震动全狱，狱方当局和看守们更是惊慌失措，以为我们要“暴动”，如临大敌。这给全狱犯人留下很深影响，也散布了一些反抗的气氛。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监狱典狱长徐康福老朽昏庸，他沿袭千百年来封建传统，利用佛教欺骗犯人，请了当地一个和尚当监狱“教诲师”强迫犯人念经赎罪修来世，以此来维护其反动统治。这位“教诲师”也曾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小木鱼，劝说信佛念经，经我们严词拒绝，还向他宣讲无神论，揭露封建迷信，骂他违背佛教教义，帮凶杀人等等。后来“教诲师”再也不来向我们唠叨了。

狱方怕我们对普通犯人宣传革命，因此把我们十二人安排在“病监”两个囚房里，以与普通犯人完全隔离，并严加防范。这个“病监”实际上是给濒临死亡的重病号用以“停尸”和家属“收尸”的地方，所以住进病监的犯人是极少能活着出来的。监狱在名义上有一个医生，年约二十多岁，是典狱长的小舅之流的私人，根本不懂医道，也没有什么药品，犯人生了重病，只有死路一条。记得这年清明节，我们得到一张“祭文”，口气是几个政治犯为了悼念同狱病死的难友的。我们多方设法探听到当时关在这个监狱中的，还有几个大革命时期被捕的政治犯，都是无期徒刑，听说还有一个反蒋的国民党军人也关在这儿，可是无法联系。

我们对病监的看守做了不少工作，经常讲日本侵略者暴行和国民党投降卖国的事例，揭发当时贪官污吏的罪行，他们都一般表示同情，看到我们很多是大学生，整天读书，彼此团结友爱，对他们也很尊重，因此对我们日渐好感，有的还和我们交了朋友，帮我们传送些消息。这些看守多是贫苦出身，我们也讲一些共产党工农革命和抗日斗争的道理，他们也能有所理解和同情。因此后来在我们进行绝食斗争中，这些看守实际上是支持和帮助了我们的。

监狱生活真是昏天黑地，暗无天日。病监囚房比普通犯人囚房还略好些，吃饭拉尿也都在房里，每天可以“放风”一会。吃的是叫做“东仓米”的饭（“东仓”二字是揣测，听说是米仓存底的米经过蒸煮，呈黄色），一股霉味。每顿是酸咸菜汤，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根本吃不饱，更谈不上什么营养了。因此大家都是面黄肌瘦，受尽摧残。

但是，这些艰苦的物质生活和肉体折磨，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崇高理想。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精神食粮，我们要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和关心国家民族的存亡。可是狱方根本不许阅读报纸刊物，也不准使用纸笔，我们亲友寄送来的书籍，只有外文书他们无法审查还放行几本，其它书籍特别是带红封面的书一概不准送入，这是我们最感痛苦的事。

我们十二个人中大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中二人虽是织绸工人，但也有中学文化程度。我们每个人都在认真学习，订有学习计划，革命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给我们讲课，还利用一些外文书学外语。我们的英文、日文、世界语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所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常把监狱称为革命大学，不少人是进了监狱成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

五月，我们称为“红五月”，有一系列革命纪念日，是无数先烈鲜血染红的五月。我们学习这些先烈的革命精神，纪念这些革命节日，为了争取生存和学习的正当权利，改善犯人的生活待遇，我们发动了一次震动全狱、全县的绝食斗争。我们先是进行说理斗争，狱方蛮不讲理，采用强制手段，并要看守冲进囚房内抓人。我们十二个人集中到一个房内，奋力抵住房门，因几个看守对我们很同情，并不用力冲门，僵持到吃饭时间，我们就宣布开始绝食，提出了要求条件，主要是反对狱方虐待犯人，改善伙食和卫生、医药条件，允许送进书报纸笔等等。狱方起先对我们的绝食的决心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后来又惊慌失措了。

开始绝食前后，我们就采取了几个措施：一是通过看守传出消息给当地报馆记者；二是给上海“民权同盟”（宋庆龄主持）去信申诉要求支持；三是由同狱政治犯郑导乐同志（现名沙梅，原为北京大学学生）给蔡元培校长去信要求援助。我们在上海监狱时，还能与党组织联系，但到一九三三年初，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因此我们到嘉兴监狱后，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绝食第二天，当地报馆有两名记者来狱采访，狱方加以阻挠，不让谈话，我们就同声高呼提出的条件，记者是能听到的。我们绝食到第三天，大家虽很虚弱，但仍坚持不吃不喝，有的小便也已呈血色。这时狱方怕我们真的饿死，他们要负责；同时又怕影响其他犯人，事态扩大；当然也怕社会舆论指责，（我们出狱后听说上海申报曾刊登嘉兴犯人绝食消息，我们未去查证）因此只好接受了我们的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狱方表面上对我们有所放宽，实际上他们在多方设法把我们这批政治犯送走。这时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这是政治犯集中营的前身）已在苏州成立，狱方就向上申请把我们十二个政治犯分两批转押到苏

州反省院。

在此有一事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绝食斗争以后，大家身体更为虚弱，肠胃受伤，常在病痛之中。不久我也发高烧，几天不退，据说是伤寒病，已到危急状态，狱方毫无医药措施，而且要等犯人死后才能通知家属“收尸”。同狱难友十分焦虑，经多次交涉，狱方才提前通知我父亲来狱，我家住附近的江苏昆山，我父亲立即到狱，并约请了陶老（陶菊如先生）同来探视。陶老是嘉兴人，经多方设法，狱方才允许请了当地名医朱斐君大夫陪同进狱看病，才挽救了我垂危的生命。（陶老曾任中央大学昆山稻作试验场负责人，技术员，与我父亲有交往，是我前辈）

嘉兴监狱从未允许家属自请医生为犯人看病，而且一般医生迷信，认为到牢里给犯人看病会“触霉头”（不吉利）。所以当时陶老能设法请到一位名医进狱，特别是给一个共产党政治犯来看病，在当时疯狂的白色恐怖下，任何人甚至亲属都怕与共产党有牵连，避开唯恐不及的情况下，陶老挺身而出，主持人道主义，冒着政治上很大风险，真是难能可贵的。

更使我敬佩的是：一九三三年陶老到嘉兴监狱探视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这十几年中，除我父亲外，他是在党外唯一知道我政治身份的人。我在一九三四年底从苏州反省院出狱，一九三五年初去日本读书，一九三六年回国后就参加地下党秘密活动，而且与陶老有经常联系。在当时几次反共高潮中，任何人只要揭发检举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也可以升官受奖的。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以后，我和陶老同在重庆、上海伪中国农民银行工作，这个银行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主办，对共产党防范极严。在上海解放前，我已打入上层任上海中国农民银行付经理，陶老任中国农民银行合资经营的上海崇裕丝厂协理，他如常密出

卖我，还是大可记功得赏的。当时，上海中国农民银行还有一位地下党员汤克湘同志，曾在成都劳动营（相当于集中营）关押过，陶老也知道他的政治身份，但都为我们保密，起了掩护作用。这不仅是陶老为人一贯正直，主持正义，同时对于共产党也有一定的认识和同情。因此在上海解放前，他拒绝银行去穗逃台的动员，而按照党的“护厂应变”的号召，坚持岗位，保护崇裕丝厂财产全部接管。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金融处举办了农贷人员训练班，陶老以专家学者和高级职员身份主动地参加受训，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并为当时接管的所谓“留用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做出榜样，起了重要的带头作用。（当时陶老是训练班中年令最大、职别最高的学员）

一九五一年我由上海调北京工作后，就很少与陶老联系。一九八一年春，我曾到嘉兴拜望陶老，并承约嘉兴县政府同志陪同探访嘉兴监狱旧址。但以时过境迁，据说原址已改为仓库，遗迹依稀难认，但五十年前的种种形象，仍历历在目，是终身难忘不可磨灭的。

以上一段回忆，只是一个年青共产党员经历的一个小小插曲，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之处。它只不过反映了：在三十年代初开始进行抗日民族战斗中，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旧社会监狱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一些共产党政治犯用生命来斗争的一个事例，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革命斗争中的支持作用。陶老现已八十高龄，仍热心公务，关心故乡建设，我也退居二线，缅怀过去，向往未来，但愿共以余年为祖国四化建设继续有所贡献。

附记：

嘉兴同狱难友十二人中，现知大致情况如下：

陈适五：（原名胡玉书，现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

沙 梅：（原名郑导乐，名作曲家，曾任上海歌剧院院长）

何振声：（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付主任）

俞 林：（原名吴百庆，曾任杭州市工商局付局长）

郑 淳：（原名沈毅人，现任广州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作者罗俊同志，原名罗俊人，现任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付主任委员，外文出版事业局顾问，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任国务院对外文委付主任）

沈钧儒老人的家世及简史

郭树权

民主人士的旗帜沈钧儒老人逝世已经二十周年，他的功业和德行历久弥新，永留人民群众的记忆中，他生平经历的莘莘大端，象组织领导救国会发动抗日、“七君子”被国民党逮捕下狱、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统治等等，已为世人周知，不须多赘。唯老人迄今尚未有完整传记行世，对其家世生平人们不完全了解。爰就所知，简作叙述，请老人家属及知情人士多所匡正。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秀水县（即今嘉兴一部），一八七五年一月二日生于江苏苏州。他的祖父沈玮宝，字仁荣，号书森，曾任江苏苏州海防同知总捕，苏州知府等职，著有诗文集，为人正直，清贫自守。祖母唐如，字韵仙，为人忠厚，同情贫苦的人，邻居求她帮助什么没有不允诺的。有时送衣服给他们穿，有人生了病，就替他们开药方，自己拿钱买药给他们。有一次甚至还典卖了一件皮袍子帮助别人，她是一个一心为别人而不为自己打算的人，因此穷人们对

她的感情特别好。沈钧儒老人对我们说，他一生的思想，受他的祖母影响最深，可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老人的父亲沈翰，字厚安，号藻卿，做过江苏候补知县，母亲潘穆琬，字佩衍。他的祖父、父亲都在江苏任职，因此就在苏州定居。老人的叔父沈卫，是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的翰林，担任陕西提学使多年。（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房师，晚年久居上海，以书法名世。沈卫老人的女儿沈玉还，人称沈七小姐，书法也很有名。）沈钧儒老人的夫人张象征，字孟婵，是苏州张一摩（字仲仁，袁世凯时曾任总统府机要局长、教育总长等职，抗战时任国民参政员，鼓吹抗日，是一著名爱国老人）的胞妹，世代书香之家。老人有子女五人：长子沈谦，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医术精湛，曾任全国政办委员，已在北京病故；次子沈晟，德国柏林大学工学院毕业，现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三子沈叔羊，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善国画，有较深的造诣，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四子沈知津，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现在水利电力部科学研究院工作；女沈谱，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现在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工作，为名记者、原新华社社长、国家科委领导人范长江的夫人。

沈钧儒老人七、八岁时入私塾读书，十六岁回嘉兴考取秀才。他的父亲病故后，于是离开已生活了二十年的苏州，前往陕西，在陕西学政、其叔父沈卫署中担任文书。他三十岁参加乡试中举人；三十岁参加会试，考中进士。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他以新科进士，被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就学于日本东京私立政法大学速成科。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沈钧儒毕业回国，从事君主立宪运动，在天津上书时，就被清政府的密探包围，由他的内兄张一摩向袁世凯疏通后，才平安无事。他在北京一度编过日报，並曾与日本留学

同学贵州人熊范舆等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一九〇九年（光绪三十五年）春，他回到浙江杭州，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鲁迅也在该校任教，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积极参加筹备浙江地方自治，是年十一月，被选为浙江省咨议局付局长，于是辞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辛亥革命发生，他以光复会会员的身份，参与了嘉兴光复的工作。辛亥革命成功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他一度担任浙江省都督府的警察局长。是年十二月底，都督府设教育司，他担任教育司长，后来辞职，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后递补为参议员）。一九一二年五月，他由褚辅成介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年八月，他参加了柳亚子等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一九一六年六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他由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张耀曾推荐，于当年冬任司法部秘书。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时，他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护法，担任参议院参议员，并兼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一九二一年，护法军政府撤销后，他由广州到上海，任政学系办的《中华新报》主笔。一九二二年六月旧国会恢复，他由上海到北京，重新担任参议院议员，并一度兼任参议院秘书厅的秘书长。一九二六年沈钧儒老人由北京回到浙江，参加国民革命。他和褚辅成等将全浙江公会扩大组织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反对军阀孙传芳，支持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克浙江后，一九二七年二月，他担任浙江省临时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清党”，浙江省临时省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解散，他被解除了所担任的职务，并于四月十四日被捕，在杭州留守营部的楼上软禁了七天。他曾作有《楼居七日记》记其事，刊

登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浙江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后来转解南京，经人营救方才恢复自由。从此他脱离政治舞台，到上海担任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教务长，从事法律教育工作，一九二八年，并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因领导抗日救国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非法逮捕为止。一九三二年一月，沈老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所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上海市分会的执行委员，并被聘为该同盟的法律委员，积极营救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辜逮捕的爱国志士。“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投降、退让的政策，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沈老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他代表该会，与其他各界救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的代表，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沈老的倡议下，组成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国掀起了救国抗日运动。在斗争的实践中，沈老一步步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了。在沈老等爱国人士的带动下，全国抗日救国活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非法逮捕了沈老及救国会其他几个负责人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和抗日救国运动的更大高潮。沈老等人在狱中坚持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历时二百四十三天，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三十一日，才被释放出狱。沈老出狱后即由苏州到达南京，不久即转赴汉口。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

国民党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他以救国会负责人之一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一九三八年十月，他由汉口到达重庆。抗战期间，沈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下，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投降、倒退的路线，成为坚强的民主斗士。一九四一年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民主同盟全国代表会议以及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沈老都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五年冬，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他当选为主席。一九四六年一月，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扼杀民主的斗争。一九四七年一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后，沈老于同年十一月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继续领导民主同盟总部的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为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他与其他民主人士，由香港秘密北上，经东北解放区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解放后沈老担任了国家领导人，参与国事的领导。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在人民政协会议上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八年，他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民盟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民盟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民盟中央主席。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沈老因高年久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故，终年八十八岁。沈老的一生，由封建时代的进士转变到民主人士的旗帜、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家，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近代斗争的历史。沈老的大名将永垂青史。

（作者郭树权同志是沈老学生，现在无锡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

记褚辅成先生掩护朝鲜爱国志士

庄一拂

褚辅成先生生前为我国耆宿，活跃政坛四五十年，一生与我国近现代史相联系，受到国人尊重，尤以晚年率领国民参议会代表去延安，得毛主席欢迎，为世人所赞称。惜于解放前一年谢世，不及得睹新天地。其生平行谊大端，如组织光复会、参加辛亥革命、反袁、反北洋军阀、反蒋介石、抗日、为民主奔走、发展实业，均见于余所著先生《年谱》中。（该文已收入浙江版《辛亥革命回忆录》）其余轶事逸闻散佚甚多，内中掩护朝鲜爱国志士一事，关系中朝人民友谊，兹先作记述，以应读者。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爆发，我国十九路军孤军奋勇抗战，战事从江湾吴淞扩大到浏河黄渡，及至我军撤离闸北，战事才告一段落。日军趾高气扬，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海军白川大將，总领事重光葵（后任外相，代表日本向联合国签降，系甲级战犯，判刑释放后，五十年代为日本改进党领袖，复任外相）到会。会议刚刚开始，忽然一声巨响，炸弹爆炸，敌酋白川大將当场毙命，重光葵炸断了腿（因此后来在米苏里号战舰上签降书时还拄着拐杖），秩序大乱，日军马上到处搜索抓人。原来此事系在上海的朝鲜义勇队所为，他们饱受日寇统治，当了亡国奴，一心要复仇复国，遂出此义举。其为首狙击之人为金九，系在华朝鲜志士的首领。金九在事成后逃入租界，因日寇仍到处搜索，在上海不能立足，不知如何相识褚辅成先生，褚老遂设法为之化装，护送金氏来嘉兴隐藏，先住在五龙桥（现二号桥）秀纶丝厂，后因丝厂人多不便，暂迁南门梅湾街底陈相生家（现为33号）。陈胆小怕事，乃由褚老出面租了港南街日晖桥褚杏仙的石库

门房子（现31号），那里十分冷落，比较偏僻。金九住在他家，对门系拉黄包车的周阿大（现尚在南门），雇用了一个女佣人周小妹，是周家的童养媳，（现尚健在，是嘉兴中丝一厂退休工人，现住该厂附近。）随后金氏把家眷接来，有两个孩子，都在南湖小学（现西南湖小学）读书。当时沈定声老师在该校教游唱课，又是日晖桥（现3号）住户，与他们家斜对面相邻，所以接触较多。据沈老师回忆，大孩子是女孩，名字叫×梅，读二年级。小的是男孩，名叫旭东，读一年级。姐弟每天往返学校，全由周小妹陪同，有时也坐黄包车，是周阿大拉的。金氏并请南湖小学六年级班主任张宗良先生（原住南门河东街口，已故）到家辅导功课。星期天常到郊外或苗圃（现人民公园）玩耍，有时金氏夫妇也一起去。金氏一家在此侨居不到二年即离去，其住处港南街石库门房子今犹见存。抗战胜利以后，从报上得知金九在我国组织了韩国独立临时政府任主席，后到上海率领光复军回朝鲜。解放初报载，他因与李承晚政见不合，受到压迫，响应金日成首相的号召，于一九四九年出奔北朝鲜，受到金日成同志欢迎，任很高的职务，他年事当时已很高，可能早已去世。褚老高风劲节，保护异国友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附记，近闻嘉兴去台人士撰述史料，言及此事，谓一批朝鲜志士，刺杀白川大将后，掩藏于嘉兴马王塘茧栈内，而不言及褚老事。其实避居马王塘者当是金氏所部，金氏本人隐藏嘉兴，为我亲闻亲见，拙妻其时适任南湖小学校长，事属确凿无疑。

（作者庄一拂同志现任市政协委员）